

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¹

周正柱 周 鹃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1418)

【摘要】: 基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 利用 2010—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 27 个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 借助系统 GMM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 实证考察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 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要素价格扭曲主要通过降低人才集聚水平、减缓城市化进程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负向影响; 分区域看,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地区和低水平地区的要素价格扭曲都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抑制效应, 且高水平地区受影响的程度要小于低水平地区, 人才集聚、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关键词】: 长三角城市群; 要素价格扭曲;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系统 GMM;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4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 (2023) 05-0029-1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以及人口流动管控政策等不断优化, 加快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跨区域有序流动, 有力地推动了区域要素市场融合。但大量经验研究表明, 我国要素市场存在明显的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 其中劳动力市场呈现城乡分割、所有制分割、行业分割等多元化分割现象^[1]。因此, 近年来如何减轻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 实现要素市场优化配置, 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2022 年 3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 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强调要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 加快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等。

而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统一市场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 要素的流动、重组以及配置都离不开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但我国渐进式改革中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 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于产品市场, 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保增长, 对劳动力、资本等关键要素的定价和分配进行不当干预, 导致要素价格普遍被低估^[2]。而扭曲的要素价格对地区要素的流动、替代弹性及配置效率都会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同样, 长三角区域也不例外, 作为我国经济一体化典型区域, 也是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重要集聚地, 但也存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滞后于商品市场、要素价格扭曲现象, 其产生的效应值得探讨。同时, 城市群逐渐成为推动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下, 以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的长三角城市群 1 为研究对象, 深入探讨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将有利于提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和经济可持续增长。

¹ 收稿日期: 2022-07-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多维测度与经济增长效应路径研究”(20BJY059)

作者简介: 周正柱(1971—), 男, 安徽合肥人,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 周鹃(1995—), 女, 江西宜春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

二、文献综述

关于要素价格扭曲效应方面的研究,从现有的文献看,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等四个方面。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周一成和廖信林(2018)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显著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同时反事实检验表明,如果消除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将每年额外分别提升4.09%和9.24%^[3];姚惠泽和石磊(2019)以江苏为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要素价格扭曲对其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4]。②对创新的影响。李平和季永宝(2014)基于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双重视角,研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对我国自主创新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5];王文波和周京奎(2021)基于微观层面,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发现,资本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创新产出显著负相关,且这种抑制效应存在异质性^[6];Qiao等(2022)利用上市电力企业数据,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效率^[7]。③对产业升级的影响。韩国高和胡文明(2017)采用系统GMM方法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明显加剧了我国工业产能过剩,阻碍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其中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作用大于资本、能源价格扭曲^[8];Zhang等(2020)、苗建军和韩经纬(2020)通过实证发现,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明显阻滞了产业结构升级,且资本价格扭曲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9,10]。④对就业的影响。王静(2016)利用第三产业分行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对就业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11];宋大强和皮建才(2020)提出要素价格扭曲会引起失业,不利于社会充分就业^[12]。

关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国外早期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和地区层面,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从性别、行业、技能等微观层面研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13,14,15],还有部分学者分析了时间距离、外资进入、国际贸易、移民政策等外部环境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16,17,18,19]。自2000年Young提出我国存在市场分割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相关问题逐渐引起重视,学者们也开始从不同视角展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研究^[20]。宋锦(2016)认为地区间就业机会、工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资源等方面的差别加剧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了劳动力市场融合^[21];王海南和崔长彬(2021)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技术差距、税负竞争、城市规模等因素会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影响^[22]。随着研究的深入,城市群层面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研究逐渐成为研究重点。陈立泰等(2017)以长江经济带劳动力市场为例研究发现,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相对最为严重,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政府支出、城镇化等因素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23];赵金丽等(2017)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行政分割、人力资本等因素会对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较大影响^[24];周正柱和周鹏(2022)则定性分析出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不均、制度性藩篱等因素抑制了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25]。总体上看,部分学者从政府干预、财政分权、户籍歧视等外部制度环境研究其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26,27],也有学者从市场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外部市场环境研究其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28,29]。

综上所述,现有的文献已分别对要素价格扭曲及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相关问题展开较为丰富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发,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从研究内容看,要素价格扭曲效应及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问题研究,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问题,但现有文献在研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时,忽略了目前我国要素市场半市场化、非市场化特征,要素价格被扭曲这一事实的影响未被足够关注,因此,少有文献将要素价格扭曲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探讨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二是从研究方法看,现有关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研究多是采用定性分析和静态面板计量方法,难以解决内生性问题,而动态面板模型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是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种动态面板方法,其中差分GMM方法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而系统GMM方法能够同时解决弱工具变量和内生性问题,有助于提高估计效率。基于此,本文利用2010—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劳动力价格扭曲和资本价格扭曲双重视角,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传导机制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①本文尝试将要素价格扭曲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既拓宽了要素价格扭曲、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内涵,又丰富了区域经济研究理论。同时,尝试从人才集聚、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等经济视角,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的传导机制,丰富了既有的研究内容。②考虑同时解决弱工具变量和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③

考虑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要素禀赋、市场一体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平衡性，本文尝试分析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异质性下传导机制差异，即考察要素价格扭曲对不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影响传导机制的异质性。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劳动力、资本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众多学者证明，扭曲的要素价格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盛仕斌和徐海（1999）、雷鹏（2009）证明了我国要素价格扭曲对就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种就业效应在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之间存在差异^[30,31]；郭圣乾等（2018）通过 VAR 模型证实了中国要素价格扭曲与城乡差距呈正相关，即要素价格扭曲会扩大城乡差距，且这种影响效应具有长期性，不利于城镇化水平提升以及劳动力市场融合^[32]；丁建勋（2017）、袁鹏和朱进金（2019）研究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会导致资本深化，对劳动要素形成挤出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33,34]。由此表明，要素价格扭曲确实对劳动力市场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在区域协调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和市场一体化背景下，无论是就业困难、城乡差距扩大还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都会对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产生影响。由此，要素价格扭曲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之间也存在重要关联。

进一步地，在唯 GDP 论背景下，地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各地区不同程度地扭曲要素价格实际上是一种权衡成本权益的行为，意味着地区之间容易为了经济增长竞争而人为扭曲要素价格以获得晋升锦标赛的胜利，可能会产生“逐低竞争”现象。即当某一地区采取要素价格扭曲，其周边地区很大可能也效仿这一做法，最终形成大部分地区都呈现要素价格扭曲现象。在这种局面下，价格机制难以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信号中介作用，可能会造成要素市场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效率降低以及经济运行效率下降，不利于要素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另外，劳动力、资本等关键经济要素的定价权和分配权一般由地方政府掌握，因此企业往往会主动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在这种寻租关系中，地方政府受经济及政治绩效的驱使，会给予资本密集型垄断性企业更多的“政策偏向”^[35]，这容易拉大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差距，加剧行业分割程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

H1：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存在抑制效应。

（二）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的传导机制

倘若要素价格扭曲会抑制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那么，其背后可能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及归纳，可以定性分析出要素价格扭曲抑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要素价格扭曲可能通过影响人才集聚^[36]、城市化^[37]以及产业结构升级^[10]，进而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1）人才集聚效应。要素价格扭曲不利于人才流动和人才积累，会降低人才集聚效应，抑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受经济保增长压力的影响，压低劳动力价格是地方政府的普遍做法^[38]，而工资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力的就业意愿及流动性，劳动力价格扭曲不仅抑制外地人才流入，还会加剧本地人才流失，削弱了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劳动力价格被压低意味着劳动者的预期收益难以弥补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促使潜在劳动力主动降低人力资本投资^[39]，长期不利于地区人才积累，导致劳动者素质技能与岗位技能需求难以匹配，造成要素配置效率下降，有碍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另一方面，资本要素价格扭曲会对劳动力要素产生替代效应，尤其对以农村劳动力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挤占效应，加上歧视性的二元户籍制度，明显不利于地区人才流动，进而阻碍劳动力市场融合。此外，资本价格机制扭曲下，国有企业一般享有更多的政策性融资优惠，且国有企业本身规模经济凸显，资本雄厚，工资福利待遇好，是公认的“铁饭碗”，吸引了大量人才流入；相反，中小企业融资艰难，相较于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更迫切需要引进人才，但因财力有限及其发展空间的制约，很难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导致中小企业的人才积累远不如国有企业，加剧了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40]。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2。

H2: 要素价格扭曲通过降低人才集聚水平来抑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2) 城市化效应。要素价格扭曲会减缓城市化进程，抑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劳动力价格被压低不仅会削弱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拉力，也会弱化周边劳动力向城市集聚的动力，导致城市化水平下降，难以充分发挥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减缓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41]。同时，劳动力价格扭曲意味着劳动力实际报酬下降，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这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挤占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模式向城镇消费模式转变是城市化的本质要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42]。另一方面，资本价格扭曲会对劳动力要素产生替代效应，尤其挤出了部分低技能劳动力，但目前我国仍存在大量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人才的积累速度滞后于资本深化的速度，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水平难以满足过度资本深化企业的人才需求，因而资本价格扭曲对于高技能劳动力同样存在挤出效应，最终造成城市就业岗位数量缩减，城市吸纳周边地区劳动力的能力降低，减缓了城市化进程，这也致使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性降低，也不利于劳动力市场融合^[37]。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3。

H3: 要素价格扭曲通过减缓城市化进程来抑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3)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要素价格扭曲会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损害要素配置效能，抑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首先，要素价格扭曲意味着价格处于失真状态，价格难以真实反映出要素资源的稀缺程度，在劳动力、资本等关键生产要素价格普遍被低估的情况下，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企业在要素选择时，偏向于这些低成本要素而非技术创新，导致企业容易陷入长期“低端锁定”困局，产业结构难以实现转型升级，造成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43]；其次，对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低端企业而言，扭曲的要素价格能够促使其利润增加，因此不愿意进行技术创新^[44]，而实际上这类低端企业对技能要求不高，大部分劳动者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会损害劳动力生产积极性；最后，在我国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扭曲的要素价格能够给企业带来扭曲收益，促使产能过剩行业仍有大量资本投入，但这也干预了产业正常淘汰机制，导致产能过剩行业产生了大批“僵尸企业”^[45]，致使产业结构趋向低级化，由此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会削弱企业竞争力、降低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4。

H4: 要素价格扭曲通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来抑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的传导机制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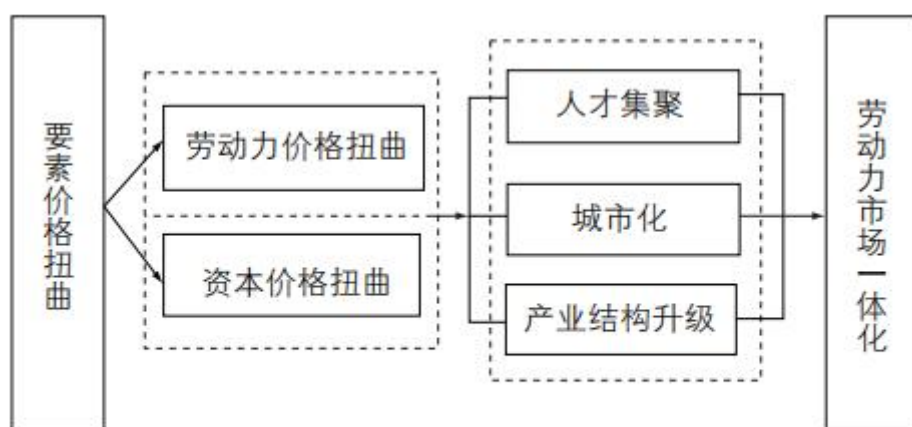


图 1 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的传导机制

四、研究设计：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1. 基准模型

要素价格是动态变化的，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直接影响着要素市场的供需结构和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渐进性和显著的经济惯性，上一期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会对下一期要素市场化改革产生影响^[46]。此外，还需考虑要素价格扭曲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内生性可能，因此将滞后一期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Integit-1）纳入模型，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text{Integ}_{it} = \varphi_0 + \varphi_1 \text{Integ}_{it-1} + \varphi_2 \text{Dist}_{it} + \varphi_3 K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下标 i 为城市；t 为年份； φ_0 为常数项；Integit 表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Integit-1 表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滞后一期项；Distit 表示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包括劳动力价格扭曲（Dislit）和资本价格扭曲（Diskit）；K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要素价格扭曲可能会通过人才集聚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途径抑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本文在公式（1）基础上，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47]的做法，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具体如下：

$$M_{it} = \theta_0 + \theta_1 M_{it-1} + \theta_2 \text{Dist}_{it} + \theta_3 K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text{Integ}_{it} = \vartheta_0 + \vartheta_1 \text{Integ}_{it-1} + \vartheta_2 \text{Dist}_{it} + \vartheta_3 M_{it} + \vartheta_4 K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Mit 表示中介变量，包括人才集聚（Talentit）、城市化（Urbanit）和产业结构升级（Industit）。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Integit）。目前关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测度，基本上以工资为基础指标，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相对价格法^[29]。该方法的理论基础为萨缪尔森的冰川成本模型，它不仅能够直接观察时序变化情况，还考虑了劳动力异质性特征，能够综合不同部门、行业测算出不同地区或不同类型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水平。本文借鉴韩帅和孙斌栋（2019）^[28]、周正柱和王云云（2022）^[48]的做法，使用相对价格法测算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计算公式为：

$$\left| \Delta Q_{ijt}^k \right| = \left| \ln \left(\frac{P_{it}^k}{P_{jt}^k} \right) - \ln \left(\frac{P_{it-1}^k}{P_{jt-1}^k} \right) \right| = \left| \ln \left(\frac{P_{it}^k}{P_{it-1}^k} \right) - \ln \left(\frac{P_{jt}^k}{P_{jt-1}^k} \right) \right| \quad (4)$$

其中：i 与 j 代表两个城市；t 代表年份；k 表示所有制，包括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P 表示劳动力平均工资； $|\Delta Q_{ijt}^k|$ 表示 i 与 j 两个城市之间同一所有制类型劳动力平均工资在 t 时期的相对价格绝对值。首先，为剔除由于劳动力异质

性、市场环境差异等造成地区间劳动力工资的相对波动，对 $|\Delta Q_{ijt}^k|$ 求平均值 $\overline{|\Delta Q_{ijt}^k|}$ ，两式相减得到相对价格

$q_{ijt}^k = |\Delta Q_{ijt}^k| - \overline{|\Delta Q_{ijt}^k|}$ 。其次，计算剔除了地区间劳动力异质性、市场环境差异等因素，仅包含市场分割因素的相对

价格 q_{ijt}^k 的方差 $\text{VAR}(q_{ijt}^k)$ ，它表示 i 与 j 两个城市在 t 时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数，数值越大，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越深，一体化程度越低。最后，按城市进行合并，得到各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数，同时，根据市场一体

$$\text{Integ}_{it} : \text{Integ}_{it} = \sqrt{1 / \{ [\sum_{i \neq j} \text{Var}(q_{ijt}^k)] / n \}}$$

化与市场分割为反向关系，得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其中 n 表示城市个数。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要素价格扭曲，要素价格扭曲包括劳动力价格扭曲 (Dislit) 和资本价格扭曲 (Diskit)。考虑生产函数法可以同时测算出多种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本文借鉴 Hsieh 和 Klenow (2009)^[49]、李言 (2021)^[50] 的做法，采用生产函数法对要素价格扭曲指数进行测算，具体如下：

$$Y_{it} = AK_{it}^\alpha L_{it}^\beta \quad (5)$$

进一步地，对式 (5) 求偏导得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边际产出：

$$\begin{aligned} \text{MP}_{K,it} &= AK_{it}^{\alpha-1} L_{it}^\beta = \alpha Y_{it} / K_{it}; \\ \text{MP}_{L,it} &= AK_{it}^\alpha L_{it}^{\beta-1} = \beta Y_{it} / L_{it} \end{aligned} \quad (6)$$

假设资本价格为 r，劳动力价格为 w，那么资本要素价格扭曲为 $\text{Diskit} = \text{MPK}_{it} / r_{it}$ ，劳动力价格扭曲为 $\text{Dislit} = \text{MPL}_{it} / w_{it}$ ，

总体的要素价格扭曲为 $Dist_{it} = Disk_{it}^{\frac{\alpha}{\alpha+\beta}} Disl_{it}^{\frac{\beta}{\alpha+\beta}}$ 。其中：Y 为各地区实际生产总值，以 2002 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处理；K 为资本存量，借鉴张军等（2004）[51]的做法，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L 为劳动投入，采用就业人数衡量；资本产出弹性 α 和劳动产出弹性 β 通过 OLS 回归得到，分别为 0.706、0.326；r 为资本价格，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6 个月到 1 年期的企业贷款月利率的均值表示；w 为劳动力价格，采用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表示。

3. 中介变量

本文中中介变量包括：①人才集聚（Talentit），借鉴张婷婷和张所地（2019）^[52]的做法，采用各城市“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技、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教育业”等 6 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比重衡量；②城市化（Urbanit），采用各城市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衡量；③产业结构升级（Industit），采用各城市第三产业比重与第二产业比重的比值来衡量。

4.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设计如下：①对外开放水平（Openit）。随着地区开放度的提高，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性和活跃度提升，有助于劳动力市场融合^[53]。因此，本文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占比衡量。②国企就业占比（Soeit）。地区国有比重越大，对市场的垄断程度越高，加深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54]。因此，本文采用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与城镇就业人数占比表示。③城乡收入差距（Gapit）。适当的城乡收入差距能够促进劳动力迁移，加快劳动力市场融合，而城乡差距过大也会阻碍劳动力迁移，不利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55]。因此，本文采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衡量。④人力资本（Inpersit）。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力技能结构呈正相关^[56]，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能够产生人力资本集聚效应，促使城市人力资本结构趋于高级化，进而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因此，本文采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来表示，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三）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 EPS 数据库，部分缺失值从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统计年鉴及其各城市统计年鉴补齐。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所列。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值	最小值	最大值
Integ	270	5.201	0.983	2.592	7.682
Dist	270	3.056	1.013	1.185	7.714
Disl	270	1.014	0.340	0.386	1.820
Disk	270	4.964	2.111	2.352	22.786
Talent	270	0.033	0.024	0.011	0.163
Urban	270	0.639	0.105	0.361	0.896

Indust	270	0.796	0.040	0.692	0.908
Open	270	0.523	0.368	0.061	2.242
Soe	270	0.274	0.132	0.085	0.681
Gap	270	2.111	0.290	1.656	3.052
Inpers	270	5.163	0.857	2.822	7.147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系统 GMM 模型实证分析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2 所列。模型回归结果均显示出，AR(1) 小于 0.05, AR(2) 和 Hansen 检验结果均大于 0.05，表明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和过度识别问题，即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效应检验结果是有效的。

表 2 中，模型（1）—（6）的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均显著为正，验证了前文中的推论，即上一期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对下一期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要素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都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要素价格扭曲显著抑制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H1 得到验证。进一步地，模型（2）中要素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为-0.665，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将下降 0.665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模型（4）中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为-1.340，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将下降 1.340 个百分点；模型（6）中资本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为-0.390，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资本价格扭曲程度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将下降 0.390 个百分点。其中的缘由可能是：首先，劳动力价格扭曲造成劳动者报酬降低、生产积极性下降，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损害要素配置效能；其次，资本价格扭曲容易引起资本深化，对劳动力要素存在挤出效应，挤压了劳动者收入份额；最后，劳动力、资本等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被低估，导致财产向资产所有者倾斜，容易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且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盲目追求 GDP 增长，使得资本密集型国有垄断企业更容易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以获得更多的要素，这也容易拉大垄断部门与一般部门的收入差距，加剧劳动力市场部门分割。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开放水平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呈显著正相关，可能是长三角城市群作为开放经济高地，有助于畅通劳动力流动渠道，加快劳动力市场融合；国企就业占比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显著为负，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往往与行政垄断挂钩，容易拉大国有与非国有两部门间的工资差距，不利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城乡收入差距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意味着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每年的“春运大潮”就是证明，加快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人力资本结构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尤其是安徽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较低（周正柱等，2022）^[25]，削弱了人力资本的整体集聚效应。

表 2 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	-----	-----	-----	-----	-----	-----

L. Integ	0.468*** (2.938)	1.462*** (3.156)	1.340*** (4.408)	0.395* (1.872)	0.357*** (2.607)	0.915* (1.877)
Dist	-0.458** (-2.018)	-0.665** (-1.979)				
Disl			-7.431*** (-2.992)	-1.340*** (-2.580)		
Disk					-0.101* (-2.051)	-0.390** (-2.397)
Open		1.662** (2.293)		0.819** (2.818)		1.354* (2.205)
Soe		-2.281*** (-2.699)		-2.517*** (-2.958)		-2.784*** (-3.036)
Gap		0.872** (2.478)		0.671* (2.548)		1.168** (3.504)
Inpers		-0.014 (-0.097)		0.259 (1.501)		-0.159 (-1.191)
cons	3.965** (4.276)	-2.163 (-1.056)	5.700*** (2.611)	1.860 (1.313)	3.673*** (4.527)	0.783 (0.283)
控制变量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AR(1)	0.001	0.014	0.000	0.014	0.001	0.040
AR(2)	0.404	0.383	0.401	0.844	0.718	0.355
Hansen Test	0.477	0.191	0.339	0.533	0.367	0.427
N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AR(1)、AR(2)和Hansen检验汇报的为P值；括号内为t值。下同

(二) 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的中介传导效应检验

(1) 人才集聚的中介效应。为验证H2，对式(2)和式(3)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1)和模型(2)所列。首先，模型(1)中要素价格扭曲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要素价格扭曲显著降低了城市人才集聚水平；其次，模型(2)中要素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为-0.340，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表2基准回归中的模型(2)相比(系数为-0.665)，系数绝对值明显下降；最后，人才集聚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人才集聚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即要素价格扭曲会通过降低地区人才集聚水

平来抑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由此，验证了 H2。

(2) 城市化的中介效应。首先，模型 (3) 中要素价格扭曲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要素价格扭曲显著减缓了城市化进程；其次，模型 (4) 中要素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为 -0.441，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与表 2 基准回归中的模型 (2) 相比 (系数为 -0.665)，系数绝对值明显下降；最后，城市化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化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即要素价格扭曲会通过减缓城市化进程来抑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由此，验证了 H3。

(3)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首先，模型 (5) 中要素价格扭曲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要素价格扭曲显著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其次，模型 (6) 中要素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为 -0.595，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这与表 2 基准回归中的模型 (2) 相比 (系数为 -0.665)，系数绝对值有所下降；最后，产业结构升级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升级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即要素价格扭曲会通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来抑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验证了 H4。

表 3 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人才集聚效应		城市化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Talent	Integ	Urban	Integ	Indust	Integ
	(1)	(2)	(3)	(4)	(5)	(6)
L. Integ		0.782** (4.768)		1.257*** (3.013)		1.598* (2.514)
Dist	-0.005* (-2.223)	-0.340*** (-3.307)	-0.002** (-2.371)	-0.441*** (-3.418)	-0.233*** (-4.228)	-0.595* (-1.761)
Talent		10.794* (1.674)				
Urban				3.680** (2.117)		
Indust						0.787*** (2.297)
L. Talent	1.395*** (8.601)					
L. Urban			0.993*** (29.937)			
L. Indust					1.078** (6.582)	

Open	-0.003 (-0.848)	0.316* (1.748)	-0.004 (-0.942)	0.602** (2.038)	0.136 (1.585)	1.063* (2.949)
Soe	-0.024** (-2.724)	-2.068*** (-4.085)	-0.014* (-1.730)	-1.081 (-1.228)	-0.597** (-2.391)	-5.047*** (-4.985)
Gap	0.004* (2.136)	0.654*** (3.334)	0.009 (1.049)	0.694* (2.910)	-0.058 (-0.928)	3.335*** (3.636)
Inpers	-0.004 (-1.477)	-0.084 (-0.911)	-0.000 (-0.242)	-0.241* (-1.675)	0.044 (1.633)	-0.188 (-0.783)
cons	0.021 (1.580)	1.211 (1.334)	0.011 (0.464)	-2.468 (-1.053)	0.657** (2.621)	-7.044 (-1.489)
AR(1)	0.072	0.002	0.056	0.005	0.017	0.054
AR(2)	0.178	0.447	0.135	0.320	0.064	0.383
Hansen Test	0.804	0.953	0.777	0.682	0.863	0.605
N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借鉴金晓梅（2020）的做法，将劳动力边际弹性和资本边际弹性分别设定为理论界比较接受的0.4和0.6，重新测算核心解释变量要素价格扭曲程度^[57]；②为了减少极端值产生的不良影响，对样本数据上下各1%分位数进行了缩尾处理。检验结果见表4和表5所列，可以看出，各核心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仍保持不变，只是估计系数的大小存在一定的变化，即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仍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人才集聚、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仍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由此表明，本文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变量	Integ	Talent	Integ	Urban	Integ	I ndust	Integ
	(1)	(2)	(3)	(4)	(5)	(6)	(7)
L. Integ	0.438** (2.736)		0.697** (5.420)		0.370* (2.434)		0.440* (3.003)
Dist	-1.297** (-2.189)	-0.007* (-1.842)	-0.853** (-2.118)	-0.002** (-2.071)	-0.900** (-2.081)	-0.244*** (-3.549)	-1.028*** (-4.280)

变量	Integ	Talent	Integ	Urban	Integ	Indust	Integ
	(1)	(2)	(3)	(4)	(5)	(6)	(7)
Talent			12.625* (1.986)				
Urban					3.582* (2.768)		
Indust							0.564° (1.668)
L. Talent		1.170*** (19.118)					
L. Urban				0.991* (74.686)			
L. Indust						1.118*** (8.791)	
cons	5.376* (3.697)	0.010* (1.901)	2.874** (2.752)	0.021** (2.103)	2.660* (2.385)	0.443* (3.774)	5.132** (5.2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R(1)	0.002	0.060	0.003	0.045	0.001	0.016	0.001
AR(2)	0.290	0.152	0.349	0.063	0.351	0.071	0.143
Hansen Test	0.505	0.137	0.761	0.132	0.726	0.387	0.833
N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表 5 稳健性检验：数据缩尾处理

变量	Integ	Talent	Integ	Urban	Integ	Indust	Integ
	(1)	(2)	(3)	(4)	(5)	(6)	(7)

L. Integ	0.387* (2.528)		0.703 (5.236)		0.429* (3.176)		0.505*** (4.125)
Dist	-0.407* (-2.428)	-0.008** (-2.195)	-0.331* (-2.523)	-0.002* (-2.352)	-0.396** (-2.121)	-0.126** (-3.112)	-0.347* (-1.962)
Talent			14.650** (2.280)				
Urban					2.499* (2.012)		
Indust							0.574' (1.831)
L. Talent		1.143** (6.733)					
L. Urban				0.983 (107.129)			
L. Indust						1.100*** (9.506)	
cons	4.268** (3.925)	0.019* (1.787)	2.011* (2.213)	0.026*** (3.810)	2.350** (2.548)	0.338** (3.015)	2.886* (3.54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R(1)	0.002	0.055	0.003	0.028	0.000	0.014	0.000
AR(2)	0.496	0.284	0.395	0.199	0.375	0.149	0.234
Hansen Test	0.325	0.696	0.708	0.389	0.717	0.201	0.775
N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四) 拓展分析：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异质性下传导机制差异分析

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市场一体化程度等方面具有不平衡性，因此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人才集聚水平、城市化进程以及产业结构会因为区域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为了考察要素价格扭曲对不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影响的异质性，根据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平均值的高低，将长三角 27 个城市分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地区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低水平地区两个样本，然后分样本进行计量回归。排名位于前 13 的城市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区（标记为 I 区）；排名后 14 的城市设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低水平区（标记为 II 区）²。分区域回归结果见表 6 和表 7 所列。

根据分区域的样本估计结果，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区（I区）和低水平区（II区）的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且低水平区（II区）受影响的程度要高于高水平区（I区）。另一方面，分区域对比中介效应。首先，分区域对比人才集聚中介效应，可以看出，两个样本要素价格扭曲对人才集聚的回归系数以及人才集聚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回归系数都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无论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区（I区）还是低水平区（II区）都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要素价格扭曲会通过降低地区人才集聚水平进而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对比表6和表7模型（3）中人才集聚的系数可以发现，人才集聚对高水平区（I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低水平区（II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其次，分区域对比城市化中介效应，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区（I区）和低水平区（II区）都存在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即要素价格扭曲会通过减缓城市化进程进而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对比表6和表7模型（5）中城市化的系数可以发现，高水平区（I区）城市化中介效应大于低水平区（II区）。最后，分区域对比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可以发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区（I区）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水平区（II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低水平区（II区）不成立。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区（I区）和低水平区（II区）处在不同的市场一体化发展阶段，人才集聚、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对市场一体化的边际效应有所不同。就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区（I区）而言，其经济基础好、市场化程度高，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能够跨域自由流动，市场机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其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基本能够实现劳动力、资本等关键要素的优化配置，促使人才集聚效应、城市化效应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负效应，因此要素价格扭曲对高水平区（I区）的边际效用较小。相对地，低水平区（II区）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市场分割问题，区域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受阻、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较低、产业分工协作不足等问题凸出，使得要素价格扭曲进一步弱化了其本就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及技术创新能力等；同时，其市场化水平较低，意味着政府影响力占上风，政府为拉动辖区经济增长往往选择强化对要素市场掌控的方式来实现，因而要素价格扭曲对低水平区（II区）的边际效用更为明显。

表6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区（I区）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Integ	Talent	Integ	Urban	Integ	Indust	Integ
	(1)	(2)	(3)	(4)	(5)	(6)	(7)
L. Integ	0.452** (1.998)		0.389** (2.268)		0.667* (4.521)		0.433** (2.407)
Dist	-0.767** (-2.786)	-0.006* (-1.951)	-0.646** (-2.579)	-0.003* (-2.443)	-0.719** (-3.968)	-0.083** (-1.980)	-0.548* (-2.329)
Talent			25.545* (1.790)				
Urban					6.129** (3.631)		
Indust							0.504' (1.755)

L. Talent		2.328*** (2.891)					
L. Urban				1.017** (44.602)			
L. Indust						1.045*** (9.162)	
cons	4.084* (1.909)	0.067 (1.920)	6.842** (4.248)	-0.004 (-0.331)	1.089 (0.735)	0.377* (3.888)	4.610* (1.95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R(1)	0.037	0.075	0.034	0.045	0.017	0.052	0.034
AR(2)	0.233	0.408	0.354	0.772	0.162	0.123	0.341
Hansen Test	0.134	0.715	0.828	0.429	0.765	0.405	0.824
N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表7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低水平区（II区）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Integ	Talent	Integ	Urban	Integ	Indust	Integ
	(1)	(2)	(3)	(4)	(5)	(6)	(7)
L. Integ	1.178** (2.486)		0.448*** (3.800)		0.434** (2.958)		0.315* (2.291)
Dist	-0.775** (-2.589)	-0.004** (-2.038)	-0.384* (-2.128)	-0.002** (-2.024)	-0.423* (-1.836)	-0.236*** (-5.073)	-0.795* (-1.705)
Talent			7.856* (1.966)				
Urban					1.642* (4.493)		
Indust							0.500 (1.061)

L. Talent		0.863** (8.630)					
L. Urban				0.969*** (126.459)			
L. Indust						0.952** (9.130)	
cons	-2.066 (-0.891)	0.004 (0.389)	2.460*** (2.701)	0.041*** (5.933)	1.391 (0.870)	0.240 (0.828)	0.046 (0.0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R(1)	0.017	0.084	0.012	0.082	0.012	0.046	0.014
AR(2)	0.880	0.154	0.810	0.207	0.850	0.252	0.851
Hansen Test	0.771	0.965	0.988	0.415	0.877	0.929	0.881
N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利用长三角城市群 27 个中心城市 2010—2019 年的面板数据，借助系统 GMM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②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主要通过降低地区人才集聚水平、减缓城市化进程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负向影响。③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两个区域的要素价格扭曲都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抑制效应，且高水平区（I 区）要素价格扭曲给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带来的负向影响小于低水平区（II 区）。④人才集聚、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两个区域人才集聚、城市化的部分中介效应均明显，且高水平区（I 区）中介效应大于低水平区（II 区），即要素价格扭曲会通过降低人才集聚和城市化水平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消极影响；高水平区（I 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而低水平区（II 区）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给出以下建议：

(1) 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劳动力、资本要素价格定价体系，消除要素价格扭曲。一方面，加快搭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以及分工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体系，畅通劳动力跨地域流动渠道，完善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保障劳有所得，提高劳动份额；另一方面，减少政府对资本要素定价及配置的不当干预行为，清除地区间、所有制间、行业间的融资歧视，加快转变“利率管制”为“利率市场化”，优化资本要素配置效率。

(2) 要素价格扭曲造成的人才流失与人才积累不足是阻碍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应深化长三角人才机制统筹规划，搭建长三角人力资源服务统一平台，健全以“跨域、互认、共享”为特点的人才管理机制，破除区域间体制性人才使用壁垒，畅通人才跨域流动机制；健全创新型人才的引进、激励和培养机制，提升地区人才集聚水平，以人才技术一体化助推劳

动力市场一体化。

(3) 要素价格扭曲会对低技能劳动力及其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减缓了城市化进程, 阻碍劳动力市场融合。应坚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破除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 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合理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促新型城镇化; 积极整合地区教育资源, 加强对以农村劳动力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 促使其劳动技能水平与岗位技能需求最大程度上相匹配, 切实保障低技能劳动力收入的稳定性。

(4) 要素价格扭曲促使价格信号失真而无法准确反映出要素禀赋的稀缺性, 导致企业容易陷入“低端锁定”困局, 产业结构趋于低级化。应强化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调配合, 明确政府的职责边界, 打破制度性藩篱, 最大程度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 深化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相协调, 转变经济增长结构, 推动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促使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

(5) 认清区域发展差异, 因地制宜制定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提升战略, 推动区域间劳动力市场协同发展。对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地区, 应重点推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新型城镇化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 促进其向更高水平迈进, 以最大程度发挥高水平地区的溢出、扩散效应; 对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低水平地区, 积极健全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 打破城乡分割壁垒, 注重以技术进步提升生产率, 以实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新型城镇化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 最大程度削弱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负效应。

参考文献

- [1] 刘劭睿, 李钊, 樊佳琪.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时空演化研究[J]. 人口学刊, 2021, 43(6):14-27.
- [2] 李言. 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成因、测度与经济效益[J]. 当代经济管理, 2020, 42(7):1-8.
- [3] 周一成, 廖信林.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理论与经验证据[J]. 现代经济探讨, 2018(8):8-16.
- [4] 姚惠泽, 石磊. 要素价格扭曲抑制了江苏经济增长吗? ——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0(6):85-91, 200.
- [5] 李平, 季永宝. 要素价格扭曲是否抑制了我国自主创新?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1):10-15, 87.
- [6] 王文波, 周京奎. 资本要素价格扭曲与创新产出——基于微观数据的理论与经验分析[J]. 软科学, 2021, 35(1):25-31.
- [7] QIAO S, ZHAO D H, GUO Z X, et al.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a's Power Enterprises[J]. Energy Policy, 2022, 164:112887[2022-06-25]. <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22.112887>.
- [8] 韩国高, 胡文明. 要素价格扭曲如何影响了我国工业产能过剩?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产业经济研究, 2017(2):49-61.
- [9] ZHANG S F, QI F, REN H R, et al. The Influence of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on Economic Structure—Based on Time-Varying Elasticity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J]. Journal of Advanced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cs, 2020, 24(4):502-508.

-
- [10] 苗建军, 韩经纬. 生产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产业结构失衡[J]. 商业研究, 2020(12):53-65.
- [11] 王静. 价格扭曲、技术进步偏向与就业——来自第三产业分行业的经验研究[J]. 产业经济研究, 2016(3):91-101.
- [12] 宋大强, 皮建才. 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 一个文献综述[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3):171-181.
- [13] SMYTH D E. Gender Differentiation and Early Labour Market Integration Across Europe[J]. *European Societies*, 2005, 7(3):451-479.
- [14] COLLIN K, LUNDH C, PRDO S. Exploring Regional Wage Dispersion in Swedish Manufacturing, 1860—2009[J].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19, 67(3):249-268.
- [15] MUJA A, BLOMMAERT L, GESTHUIZEN M, et al. The Role of Different Types of Skills and Signals in Youth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J]. *Empirical Research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19, 11(1):1-23.
- [16] JOHANSSON B, KLAESSON J, OLSSON M. Time Distances and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2, 81(3):305-327.
- [17] GANDOLFI D, HALLIDAY T, ROBERTSON R. Trade, FDI, Migration, and the Place Premium: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7, 153(1):1-37.
- [18] PETERS M E.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Trade and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20, 23(2):391-412.
- [19] SAABNEH A, TESFAI R. Does Immigrant Selection Policy Matter?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of Ethiopian Immigrants i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21, 40(5):955-985.
- [20] YOUNG A.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4):1091-1135.
- [21] 宋锦. 中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问题研究[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18(6):103-109, 148.
- [22] 王海南, 崔长彬. 财政分权与中国省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基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J]. 经济问题, 2021(5):55-62.
- [23] 陈立泰, 李金林, 叶长华.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测度及影响因素——基于劳动力工资视角的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 2017, 31(3):5-12.
- [24] 赵金丽, 张学波, 宋金平. 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评价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7, 37(5):94-100.
- [25] 周正柱, 周鹏. 长三角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分析与建议[J]. 财政科学, 2022(2):52-65.
- [26] 陈红霞, 席强敏. 京津冀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6(2):81-88.

-
- [27] 单爽.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研究——基于工资决定机制的视角[J]. 上海经济研, 2021(5):61-75.
- [28] 韩帅帅, 孙斌栋.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时空演化[J]. 人口与经济, 2019(2):92-104.
- [29] 刘昊, 祝志勇.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软科学, 2020, 34(10):90-96.
- [30] 盛仕斌, 徐海. 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J]. 经济研究, 1999(5):68-74.
- [31] 雷鹏. 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J]. 社会科学, 2009(7):61-65, 188.
- [32] 郭圣乾, 俞远鹏, 唐雪. 资本与劳动力价格扭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 宏观经济研究, 2018(9):64-71.
- [33] 丁建勋. 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7(1):1-13.
- [34] 袁鹏, 朱进金. 要素市场扭曲、技术进步偏向与劳动份额变化[J]. 经济评论, 2019(2):73-87.
- [35] 邹涛, 李沙沙. 要素价格扭曲阻碍了企业有效市场退出吗? ——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J]. 产业经济研究, 2021(6):87-100.
- [36] 赵新宇, 郑国强. 劳动力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21(6):112-124.
- [37] 夏蕾. 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J]. 城市问题, 2018(5):73-78.
- [38] 赵新宇, 郑国强.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要素市场扭曲[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0(10):37-49.
- [39] 刘瑞明, 亢延锴, 黄维乔. 就业市场扭曲、人力资本积累与阶层分化[J]. 经济学动态, 2017(8):74-87.
- [40] 孙婷, 卞学宇, 张明志. 要素匹配质量视角下要素价格扭曲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21(9):44-54.
- [41] 阚大学.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城镇化效率提升吗[J]. 财经科学, 2016(8):113-123.
- [42] 何春丽, 曾令秋. 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J]. 改革, 2019(7):150-159.
- [43] 赵新宇, 郑国强, 万宇佳. 官员激励、要素市场扭曲与产业结构升级[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6):159-166.
- [44] 夏晓华, 李进一. 要素价格异质性扭曲与产业结构动态调整[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9(3):40-48.
- [45] 鞠蕾, 高越青, 王立国. 供给侧视角下的产能过剩治理: 要素市场扭曲与产能过剩[J]. 宏观经济研究, 2016(5):3-15, 127.

-
- [46] 卢新波, 张经纬. 土地财政阻滞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了吗? ——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J]. 财经论丛, 2018(4):18-30.
- [47]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731-745.
- [48] 周正柱, 王云云. 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研究[J].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22, 27(4):75-84.
- [49] HSIEH C T, KLENOW 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4):1403-1448.
- [50] 李言. 中国城市群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比较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21(10):152-164.
- [51] 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2000[J]. 经济研究, 2004(10):35-44.
- [52] 张婷婷, 张所地. 城市公共性不动产结构、人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经济问题探索, 2019(9):91-99.
- [53] 李坤望, 陈维涛, 王永进. 对外贸易、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中国人力资本投资[J]. 世界经济, 2014, 37(3):56-79.
- [54] 刘瑞明. 国有企业、隐性补贴与市场分割: 理论与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2(4):21-32.
- [55] 许文静, 方齐云. 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化与城镇化[J]. 经济问题探索, 2018(5):100-109.
- [56] 毛丰付, 郑芳. 人才引进政策如何影响了劳动力市场? [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1(11):62-77.
- [57] 金晓梅. 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测度[J]. 经济与管理, 2020, 34(4):32-37.

注释

①本文“长三角城市群”特指《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的“以上海市, 江苏省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 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 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27 个城市为中心区(面积 22.5 万平方公里)”, 其中江苏包括南京、无锡等 9 个城市, 浙江包括杭州、宁波等 9 个城市, 安徽包括合肥、芜湖等 8 个城市。

②本文“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区(I区)”指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金华、合肥、芜湖 13 个城市;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低水平区(II区)”则指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14 个城市。